

---

# 薛化元先生訪問紀錄

訪問：詹素娟、劉永筑、溫翔任、陳令洋、郎咏恩、  
林子庭

記錄：林子庭

時間：2015年7月10日

地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17 會議室

薛化元教授，1959年出生於彰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學士，其後師承台大歷史系李永熾教授，取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與博士學位。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主任、臺灣史研究所所長，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專任教授暨歷史學系合聘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史、中國近代思想史、憲政史。於2001年進行「台灣省諮議會口述歷史暨史料彙編計畫」，並於2008至2009年間參與「國會耆宿口述訪談計畫」，並於2010年陸續出版羅傳進先生、許張愛簾女士、張平沼先生三人的訪談錄；2011年出版《王南傑牧師—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口述歷史》。薛化元教授長期關注台灣憲政發展、人權問題與社會運動，不僅承接官方口述歷史訪談計畫，個人亦有特殊的訪談理念與訪談方式。

## 家世背景

### (一) 來自彰化的孩子

1959年11月10日我在彰化基督教醫院出身，幫我接生的是小蘭醫師<sup>1</sup>的太太。我們出身一個沒落的家族，一般而言，地主是在耕者有其田<sup>2</sup>才失去田產，我們這一房是1949年就失去所有田產。因為我家在三七五減租之前已經把田收回自己耕作，那也是我們家族分產以後，除了共有的田產和布行之外，我祖父唯一可以賴以生產的。結果原本的佃農去找了警察局施壓，我祖父被叫到警察局蓋土地讓渡的印章，我祖父還有什麼好說的？雖然家族那麼多人，可是親族不足以依靠。所以我伯父對此非常不諒解，他認為我祖父太軟弱，日治時期我曾祖父被拘留二十九日，才被迫捐了彰化縣議會一帶的土地，我祖父只被抓了一天就挺不住，沒有顧慮一家只靠這一小塊田地過活，使得家境更為貧困。而且，當時為了讓這塊田地有比較好的收成，伯父還節省了師範學院部分的公費寄回家改善土地，我大姑媽也回家協助，最後一切都枉然。直到最近我出去參加活動的時候，有的彰化老一輩的鄉親還會問說：「你是不是某個家族出身的？」

- 1 蘭大弼醫生 (David Landsborough IV, 1914-2010)，出生於彰化縣，蘇格蘭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創辦人蘭大衛 (David Landsborough, 1870-1957) 醫師之子，為長老教會傳教士，彰化基督教醫院榮譽院長。在台灣服務奉獻三十餘年。以為窮苦人民提供醫療服務為終身職志。
- 2 耕者有其田，1953年1月26日蔣介石公布「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地主保留 (中等水田三甲、旱田六甲) 及免租耕地。政府徵收地主超額之出租耕地，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

據長輩說，我的家族長期都是反國民黨，在早期應該是從來沒有投票給國民黨，特別是石錫勳<sup>3</sup>選彰化縣長，我們家族都是挺他的。但是，後來個人際遇不同，政經背景也越來越複雜。所以有一次我堂妹結婚，碰巧遇到選舉，我一個表叔就說：「這裡有沒有人投票給國民黨？」，我說有，他問我是哪一個，我都不好意思講。畢竟家族很大，難免有聯姻關係，像是我表弟當時準備娶某位國民黨籍立委的女兒，這很複雜。

因為是沒落的家族，所以家族中只有在我們這一房大伯父之前，可以讀書的全部去日本留學。我大伯父薛克旋讀了師範學院，是我家族中曾經受到白色恐怖影響的，他因為受四六事件<sup>4</sup>影響而曾經「跑路」，後來還是回到師範學院讀完，四六事件當時離開只是暫避風頭。我爸爸叫做薛克亮，他根本連報考中學都沒有，讀彰化高工畢業，他總覺得不甘我們這一房沒落，其他房都有許多醫生或是企業家，老想要扳回顏面，所以我父親職業更換得很頻繁，只要有機會就拿我媽媽陪嫁的資金去投資，不過，直到 1980 年代中期以前一直沒有很順利。當時他同時還考上彰商，後來家族協商要我爸爸放棄彰商，讓我另一房的伯父替代。我知道這件事大約是讀中學的階段吧，當時家裡的狀況不太好，最早是我大姑婆一再舉這個例子告訴我，我爸爸是個有能力的

---

3 石錫勳（1900-1985），彰化人，畢業於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校，曾任文化協會創會理事。戰後三度投入彰化縣縣長選舉，並於 1960 年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

4 四六事件，1948 年由台灣省立師範學院為主體，串聯國立台灣大學發起的學生運動。警方與學生發生衝突，其後警方進入校園逮捕學生，造成學生紛紛出走。

人，會有發展的時候。

我媽媽黃銀蟾，是彰化女高畢業。她前幾年生病後，我常常回去跟她聊天，常常聽她講過去的事，有時候也陪她和同窗的阿姨們見面。聽她們和我媽媽說，媽媽的高中同學，至少有兩個彰化縣長的女兒、立委的姐姐、縣長的夫人還有當時彰化市富豪家的媳婦，還有在反對運動中最著名的高俊明牧師的夫人高李麗珍。我媽媽最早跟我提到二二八事件，就是提到高牧師娘家人的受難。現在想想以父母在彰化的人脈，我應該早點做口述歷史才是。我媽媽是喜歡自由風氣的人，所以在戰後初期就打テニス（tenisu，網球）。媽媽只是運氣不好沒考上大學，不然我外祖父很疼她，應該會讀大學吧。基本上媽媽很尊重我們，但萬一考試考不好的話，事情是非常嚴重的，回家要小心了。

我大概搬過一、二十次家吧。上了兩個還三個幼稚園，上了三個小學，兩個國中。住過的地方滿多的，出生在彰化，然後回來台北市安東街，當時我爸就在建國啤酒廠上班。後來就搬去埔里，在埔里搬家兩次，又回到彰化，再到三重埔，那時我爸爸到味全集團的大全彩藝上班。在三重埔又搬過兩次，再搬到士林，搬到社子島，搬到中崙，中崙再搬回到士林，在士林搬兩次家。接著，搬到民生東路新社區，然後爸爸想自己創業又到台中，在台中又搬家兩次。然後因為爸爸的安排，我就回來台北考高中。考高中的時候，住在當時中興大學法商學院<sup>5</sup>那裡，接著我們家搬去中和，因為讀大學不方便，我自己就到木柵。後來大四那年

5 民國50年7月，臺灣省立法商學院奉命與臺灣省立農學院合併為臺灣省立中興大學。中興大學校本部設於臺中市，並同時設理工學院，法商學院仍在臺北市合江街原址。

生病，我也是從那年開始不能喝酒。接著讀研究所，然後當兵，當兵回來我買自己的房子。我的房子買得很早，退伍回來我的導師孫鐵剛老師就一直催我找房子，還預付了為數可觀的稿費給我，加上我過去存的一些積蓄和父母的贊助，湊了二、三十萬就買房子了，就是我原本住在圓通路的房子。後來我結婚，我太太因為懷孕，小孩子一開始沒有很穩定，她回娘家比較方便，直到孩子五歲上幼稚園。我覺得一人住一個地方，各自為王，這樣不是辦法，就搬回到台北。可是我當時買的台北房子很小間，有時還在飯桌上寫論文，所以後來才搬到目前住的房子。

## （二）與歷史的邂逅

我的父親大概是希望孩子可以讀理工，而我一直到國中為止理化都不錯，我考進政大的時候，大學有能力測驗，結果出來要把我笑死了：我的數學一百個人贏九十九個；我的中文輸五十個，我還讀文學院！還有希望嗎？可是我對歷史真的很有興趣，所以我跟我媽媽說：「我物理不錯，可是物理也不見得比歷史有搞頭」。縱使讀文組以後，直到聯考報告填志願那天，我還和同學把志願卡換掉，然後才跟我媽講說我把志願卡換掉。我媽問我要怎麼辦？我說：「我讀歷史系，當年台灣有五百個學生啊，我程度大概不會沒有前五名」。但我後來知道大概就算是第一名都可能會失業，這是長大以後才知道，年輕的時候比較勇敢。我媽媽唸歸唸，實際上不就是小時候讀那麼多書長大的嗎？那些書是她買給我的嘛，從小一路讀到大。

我爸爸從我很小的時候就有出國的機會，加上有國外的親友會來，幼稚園開始，我們家就開始有日本的小學館的圖畫書。他

大概是想給我看科學類，買航海的、交通的歷史。他認為是科學類，但其實是歷史啦。日本的書從過去畫到未來，爸爸覺得是科學類，我覺得是歷史性的。大概是這樣的背景之下啦，我小時候最喜歡讀歷史，想說要讀蒙古史還是世界史。所以鄭欽仁教授榮退論文集裡我寫了一篇蒙古史的文章<sup>6</sup>，是對自己的歷史做一個交代，我喜歡我寫，雖然我知道我沒辦法在這個領域再突破。蕭啓慶老師<sup>7</sup>在我碩士班一年級上他的課的時候，就問過我一場攸關成吉思汗關鍵性的戰役成敗的原因，說：「你寫到這樣子怎麼辦？」我說：「所有的記載看起來，影響最大的就是那一場風雨嘛！」他說：「你認為風雨決定這場戰役嗎？」我說：「我能看到的就是這些，所以只能寫到這樣」，蕭先生最後給的評價還不錯，不過，我知道這樣是不夠的。直到我升了教授有機會還問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者，有沒有比較好的解釋可能？

話是這樣說，不過我當年聯考考砸了，勉強考上政大。這是因為經濟的因素，我一定得留在北部的國立大學才行，另一方面我也沒想到會到這麼爛。當時，我還打電話找聯招會的主委師大的張校長，抗議聯考的答案錯一堆，害慘我了。他風度很好，不過答案錯還是錯了。最後我還是轉系才能讀歷史。

6 薛化元，〈札木合在鐵木真統一蒙古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安答與爭雄對手〉，鄭欽仁教授榮退紀念論文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9.12。

7 蕭啓慶（1937-2012），江蘇泰興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其專長為遼、金、元史、蒙古史、中國近世社會史、中國軍事制度史。

### (三) 啓蒙人物：我的高中老師們

我跟我幾個高中老師到現在都還有往來，我們有的現在用 line，或是用 email 聯絡，我的老師們也很先進的。我真的是很感謝他們，我成長階段是在戒嚴時期，有些意見不一樣是很危險的。我當年讀台大林瑞翰<sup>8</sup>教授的中國通史，高一的作文我寫說：「根據史料判斷，岳飛就是大軍閥。」後來，我才聽說林瑞翰因此被監察院和情治單位約談，差點被台大 fire。我的國文老師蘇老師也覺得很有道理，我就跟他講說感謝他。

我高中的歷史老師更好，高一的郭老師問我們說：「覺得課本有沒有什麼問題？」我覺得幾乎每個章節都有問題，所以我都有意見。他說有意見，那就講，講得有道理就加分。就講得就更多啦，問題就更多了，因為覺得每個章節都有問題。我對歷史本來就很有興趣，就越讀越多。應該這樣講，從小對歷史就有興趣，又有人鼓勵就越搞越大，怎麼可能越玩越小。高二開始的歷史老師是張老師，他始終沒放棄研究的熱忱，除了認真教學，他也常常隱約告訴我們當時外在環境的狀況。一直到前幾年，只要收到張老師寄來的書，就是我更加努力投入的動力。

這樣讀到大學，大學在政大，我覺得政大對異議的學生相對有一個優點，可能是國民黨的歷史背景，基本上把學生當作自己人。所以現在回想，如果我當時在其他地方可能會比較麻煩，政大相對比較可以容忍我們。我記得研究所我到台大，情治單位調

---

8 林瑞翰(1927-2015)，字伯羽。1948年考入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於台大歷史系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著有《中國歷史》、《魏晉南北朝史》、《中國通史》等。



我的資料，我在政大的幾個學長姊被約談後，有找現在暨大教書的學長打 pass 給我。台大方面，現在嘉義大學李明仁教授<sup>9</sup>說調查局的官員到他家去，要我自愛一點。但都沒有人直接找我，應該是我太小咖，都從周邊讓我覺得恐懼。我還曾經聽到現在政大政治系任教孫善豪傳來的消息是，情治單位打給政大負責安全工作的教官，剛好是我以前的系教官，他碰巧經過聽到教官說：「我們薛化元好好地，到你們那邊變怎樣了？」我在學校發表的言論或是寫的批評文章都差不多，只是在台大容忍度就低一點。

#### (四) 研究所之路

我因為有機會在大二的時候先讀到 Max Weber 的理論，同時還讀到的是，魏復古 (Karl August Wittfogel) 的東方專制主義<sup>10</sup>，他的理論當時被臺灣主流媒體罵到狗血淋頭的。因為政大就是一個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的學校，我在大三的時候開始讀西洋政治思想史，當時自己本身就決定讀研究所應該要做思想史。

等到考上研究所，原來政大一些老師建議我留在政大。我那年考得還不錯喔，我離錄取標準大概多出一百多分。但我覺得人

---

9 李明仁，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現任職於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教授。

10 東方專制主義 (oriental despotism)，為德國裔美國歷史學家魏復古於 1957 年發表的《東方專制主義——對於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中提出的東方專制主義的發展，將自然地理與文化條件概念化，建構具有制約化的生產概念，認為東方的經濟發展有其特色，其缺乏推動萌芽資本主義的內在動力，因此必須建構一個專制暴君 (despotism) 的概念，國家才能有效地分配、集中與消費剩餘價值。



應該尋找另一個成長的空間，我記得孫鐵剛<sup>11</sup>老師知道我對思想史有興趣，跟我說：「你到台大就去找李永熾<sup>12</sup>啦！」孫老師說要幫我介紹，我就說這種事我自己來就好了。但是拜師的過程並沒有很順利，我找李老師指導，第一次講了四個小時，他不收我啊！他說我的主題看不到突破點，我又跟他約了一個禮拜，又跟他講四個小時，我跟他說我一定會成功，他才勉強相信我的題目做得出來。我寫的就是晚清中體西用論，當時已經寫過不少本相關論文了，相關學位論文一大堆，現在影印堆起來應該到腰這麼高，所以說這樣子，看起來實在不容易有搞頭。但我相信一定可以突破，他就覺得很奇怪。剛好 Cambridge 出了一本日本學者寫明治維新的書，孫鐵剛老師買了一本，就先借給我。我看這本書這樣寫，用這 approach 來看中國近代思想史，一定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我還記得我的大學一位同學是余陳月瑛的親戚，她說：「你不要想逃啊，做思想史」，我說：「以後思想史不會比政治史沒有用」。她以為我因為怕碰政治所以做思想史，但當時我在台大參加社團的運動，是一個禮拜中午幾乎在社團辦公室吃飯，白天讀書有限，回家都不睡覺，因為書讀不完。李永熾老師最常說：「你參加運動，但你讀書的時間不能減少。參加反對運動，一定要更努力做好本分。」所以我基本上也不帶我的學生去參加運動，學生可以自主去，我不帶學生去上校外民主課。對我來講，

---

11 孫鐵剛，台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現為政治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專長為中國考古、中國古代史、先秦兩漢史籍。

12 李永熾(1939-)，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長期從事近代思想史研究，曾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老師對我的影響很深。這種事情過去就是會被盯上，你就好好把事情做完，學生可以自主的發展。

我的其他老師以為，是因為李老師參加運動簽了什麼名，所以我會簽。實際上我的老師從來也不管我啊，而且我在大學畢業後，就參加了一些黨外活動，這些都是自主的。例如說郝柏村當行政院長的時候，我們聯名反對軍人干政，名字還登在報紙廣告上。一個很愛護我的政大老師請我吃飯時，便說要請李老師不要讓我參加這些政治活動，當他知道是我自主做的以後，就說：「薛化元你怎麼這樣，畢業去哪裡教書啊？」

我很驕傲的是，也是跟李老師學到的，就是「寫學位論文是用生命去寫的，所以一定要達到一定的水準」。常跟學生說，論文寫壞了，可以重寫，就是學位論文沒辦法。我的碩士論文固然沒辦法和李老師比，但是出版後也受到學界相當的矚目，日本很快就有書評，日本、韓國也有許多學者引用。

如果找到第一版我的碩士論文<sup>13</sup>的話，我曾經這樣寫：「如果你相信歷史是一門沒有價值判斷的學問，只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無知；第二是說謊」，我在序裡面這樣寫。李老師就要我刪掉，他不是不同意，而是為了保護我。因為這在高唱價值中立的年代是大忌，我跟李老師讀書，知道韋伯講的是價值自由，但是我這樣寫序，會給我自己帶來困擾。我的碩士論文修改後畢業，後來才又出版，我忘記從什麼時候開始沒有這段話了，是口試還是口試後。不過我有留下前面一段解釋，我寫這一段的原因

---

13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研究（一八六一～一九〇〇）〉，臺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是我對自由民主這麼的喜歡，所以我決定一定要寫中體西用論，因為中體西用論是不利於東方引進近代自由民主價值、制度的發展的，它就是要朝向自由民主發展的絆腳石。這樣的討論在我論文的脈絡中，是沒有討論的。後來，我把這個想法寫成文章發表在《當代》上。在碩士論文出版第三版的時我就把這一篇文章當成附錄附上去，對我而言，從傳統中國儒家文化可以開出自由民主的論述，我是不相信的，而且在理論上也無法推出來，大概是這樣的狀況。

## 覺醒：台灣獨立意識的形塑

### (一) 衝擊：「退出」聯合國

如果要說國家定位的問題，想起來最早影響我的應該是：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代表權。我的年齡那時候不大，但因為媽媽的鼓勵，我從小學三年級開始看報跟看《讀者文摘》。我記得那時《台灣新生報》第二天的第二版，跟你們現在讀的一般說法都不一樣，把那一年聯合國大會所有的表決決議和經過通通寫在裡面，雖然也搭配國民黨的官方說法，但我看到、聽到就知道國民黨的宣傳，就覺得都亂搞嘛，騙誰啊！因為每一個議案都有寫，所以我知道表決了什麼案子，當我知道白色恐怖以後，比較好奇的是那位編輯後來有沒有怎麼樣？真的把每一個議案如何表決、內容都寫得那麼清楚。我才十出頭歲，覺得很 shock，My God！怎麼會是這樣！後來讀國中，就開始跟我的同學吵架，國民黨少騙人了啦！什麼日本跟「共匪」建交，就要跟日本斷交，我認為

如果是美國的話，一定緊抱美國的大腿，所以我也不會相信什麼反攻大陸。可能太年輕就知道這個東西了，對我的成長產生一種越來越緊張的關係。

現在我有和高中同學定期吃飯。提到以前我們曾經互丟鞋子，在黑板前隔著講桌對罵。原因之一就是對台灣前途問題的想法有差異、對國民黨的看法不同；再來是我很討厭儒家，很不喜歡孔夫子。所以我對老師們真的很感念，他們如果沒有保護我，我大概就完了。



《台灣新生報》，民國 60 年 10 月 27 日，第二版。

## (二) 召喚：作為主權國家的決心

美國宣布即將和中華民國斷交那一天，我坐的是欣欣客運的車子要到政大去讀書，欣欣 21 路吧，現在改成 254。我剛剛到學校，我的導師問我在路上有沒有聽到廣播，我說我聽到了啊。老師問我：「有沒有聽到 non-nation」，美軍電台稱我們是 non-nation，說我們不是國家，我說我沒有聽到。但如果當時問我有沒有想過中共政權會侵犯台灣，我覺得沒有那麼嚴重，你們想一想，共同防禦條約還在，而且事後我對中華民國國軍的戰力一直到 1990 年代還很有信心啊，包括我去當兵，我覺得我的部隊是能打的，你試看看啊！更不要提我歷史系學長當預官排長，在師對抗中，帶著自己的部隊，深入敵後，逮捕對方的指揮官兩次。所以，我認為不是不能打，認真就可以好好地守衛自己是有能力的，但現在可能是比較困難了，現在部隊這麼少。

我當時只是想說：「怎麼斷交來得這麼快啊！」但絕沒有想說中共政權馬上要犯台，我沒有想過這種事情。現在想一想還有第七艦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在通知一年以後才廢止啊。那時候腦中加速的是覺得國民黨的無能。稍後中華民國退出 IMF<sup>14</sup>，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當時有報紙頭版內容還寫說：我們因為退出

---

14 IM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立於 1945 年 12 月 27 日，為世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職責是監察貨幣匯率和各國貿易情況、提供技術和資金協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其總部設置於美國華盛頓特區。中華民國是該組織創始國之一，自 1945 年 12 月 27 日至 1980 年 4 月 16 日止行使中國代表權。1971 年後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有所更換，根據會籍普遍化原則，於 1980 年 4 月 17 日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 IMF 的中國代表權。

IMF 也可以把黃金拿回來，現在黃金很值錢，可以賺很多。連我隔壁的比較親國民黨的外交所學長都說：「怎麼這樣寫啊？」被人家拋棄還以為自己賺很多錢，這什麼的行爲？這讓我對國民黨的無能有深刻的認知。

美國宣布不承認中華民國那一年，我們班和其他政大學生一樣被動員去敦化北路抗議，美國派特使來談判<sup>15</sup>，不過那晚我沒有去。基本上，我的台灣意識是建立在不相信國民黨那一套行得通的狀況之上，可能一開始想的不是台獨，可是知道台灣要做一個正常的國家，我很清楚我們不可能代表中國。我不支持國民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不小心聽到康寧祥演講。印象比較深刻是小學，康寧祥第一次選市議員<sup>16</sup>，那個傳單上寫：「我們的血汗錢流到哪裡去了？就是國民黨拿走了。」當時傳單一定要蓋候選人的標記，來不及印，他們用那個紅蘿蔔做印章，直接蓋。我後來知道管碧玲的老公許陽明<sup>17</sup>，也有蓋，他後來告訴我有一部分是他蓋的。

所以我跟我朋友覺醒的過程是不一樣的，我先知道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代表中國是不可行的，但我一開始並沒有想說台灣要獨

---

15 1979年元旦起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時任美副國務卿的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於1978年12月27日代表總統卡特，率中美關係諮商代表團來台說明斷交事宜。27日晚上搭乘專機抵達台北松山軍用機場。

16 康寧祥（1938—），台北萬華人，於1969年參加台北市改制直轄市後第一屆台北市議員。素以良好的辯才與口才聞名。

17 許陽明（1952—），台北新莊人，曾任民主進步黨機關報《民進報》總編輯、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民主進步黨副秘書長、中央選舉委員會委員、台南市副市長。



立，讀到的訊息也沒有這些東西，我只知道到說反攻大陸不可能，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已經被替代掉了，所以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做一個主權國家，這樣子強烈的價值在召喚著我往我以後的路走。對我來講，中華民國既不可能反攻大陸，也沒辦法代表中國，那這樣我們要怎麼辦？台灣當然要走出自己的路，對我而言，台灣走出主權國家的這種驅動力，當然越成長越成熟。不過，直到大學為止，因為還認為台灣是在中華文化籠罩下，所以批判傳統中華文化，批判中華文化的頭腦結構裡面，就代表中華文化在台灣還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文化上還沒有台灣獨立自主的概念，在政治上則是清楚了，我們要做一個主權國家。對我而言，看起來國民黨的政策方向不是這個取向，他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 （三）從「民主」到「自決」

我整個成長背景滿複雜的，反正對國民黨的，或是說整個國家認同是逐漸清楚。當時沒有那麼強烈的出現「台灣獨立」這個名詞，但我了解要代表中國是絕不可能的，中華民國在國際空間又不可能存立，怎麼辦？是這樣慢慢發展出來我後來的國家認同觀念。家裡的長輩曾提到葉公超說：「欲求兩個中國而不可得」，大概是這樣的概念吧。當時，也和一些朋友在政大東方文化社開始談到一些台灣獨立的主張，但是基本上是以民主包裝的，也沒想到要如何才能真的實踐。

但是，台灣應該作為一個跟中國不一樣的主權國家這件事情是確定的，所以後來我在民社黨的雜誌寫文章，我甚至跟民社黨負責刊物的長輩主張說至少是兩個中國，他們也接受一部分。我



的學長翁佳音聽到後，告訴我，如果真有可能，就太好了。但是民社黨基本上認為以後就要統一，他們要這樣寫我也沒有辦法。我知道一定要做一個主權國家，國民黨這樣做一定「穩死」的，一定不對，沒有什麼好說的。然後慢慢的「自決」這個主張被黨外人士公開標舉，才確定要怎麼辦，原來是要「自決」，以前是想到要民主，現在終於知道要「自決」，慢慢確認這個東西，大概這是要到 1980 年代初期。

## 白色恐怖口述訪談經驗

### (一) 第一次的口述訪談經驗

我做口述歷史的經驗和大家很不一樣，我原來沒有希望從口述歷史裡面得到什麼新的見解，我一開始只是想知道我讀到的文本對不對，我要找當事人來驗證。所以正式作第一次比較像樣的口述歷史是訪問當時民社黨的主席楊毓滋<sup>18</sup>，那篇文章有發表，可是楊老講了一些和我知道的台灣史有落差的內容。我當時已經知道楊毓滋有參加 1960 年中國民主黨的組黨，他講的事情我就覺得怪怪，因為他一直迴避如何參與籌組新黨，這怎麼樣都跟我的認知差距滿大的，只能說是遺憾。那時候我博士班還沒畢業，我覺得很挫折，知道楊老講的東西，可能有現實的考慮，很多

18 楊毓滋(1905-1994)，原名祖培，江蘇省興化縣人。曾任職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總統府國策顧問、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長、祕書長、《民主中國雜誌》發行人等。



2012年，薛教授出席大地文教基金會舉辦之「從當代問題探討台灣主體性的確立研討會」（照片來源：大地文教基金會網站，[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061&Itemid=1](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6061&Itemid=1)）

和事實有些出入，楊毓滋先生跟我說：「不是這樣」、「不可能是這樣」。所以，我就沒有再做下去。而這影響我對口述歷史的看法，因此正式做口述歷史，要到 2000 年以後。

## （二）承接官方口述歷史計畫

正式去做第一本口述歷史出版的書，那真是虧大了！連掛名訪談都沒有！那是張炎憲<sup>19</sup>當國史館館長的時候，我記得是陳進金<sup>20</sup>來找我說：「是不是能做個口述歷史？」我答應了。第一個做顧紹昌先生<sup>21</sup>，他跟楊毓滋以前關係最深，因為顧先生是民社黨的，我跟他從 1982 年開始有私交，在我學生時代，在民社黨的機關刊物《宇宙》、《再生》持續寫文章，他們都提供我很多幫助。我認為要了解台灣早期的民主運動，一定要注意民、青兩黨

19 張炎憲（1947－2014），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台灣史學者，2000 年到 2008 年間任國史館館長，曾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台灣歷史學會會長等職。

20 陳進金，現任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專長為近代中國教育史、檔案與民國歷史、戰後台灣史、口述歷史、中國現代史。

21 顧紹昌（1923－已故），江蘇興化人，曾任中國民主社會黨秘書長，長期投入民社黨黨務與選務工作。亦參與東海大學建校，退休後再至東吳大學服務。

中比較反對國民黨，強調民主憲政這些勢力的發展。後來因為審查的關係，沒有掛名一直覺得很遺憾。

第二本就是做鄭欽仁<sup>22</sup>老師的口述歷史，我知道鄭老師對這本口述歷史沒有很滿意啦。但這一本口述歷史讓我們動員了三個博士去做，就我、劉季倫<sup>23</sup>跟潘光哲<sup>24</sup>，我認為鄭老師最信任劉季倫，所以助理整稿後，整個劉季倫根據他的訪談筆記先看過一遍，再給我，再回傳，所以他的稿子從初稿到整稿整了四次，所以一般整稿我們整一次就整完，整老師的稿整了四次。初稿給劉季倫看過，再給我看過再，給鄭老師看過，再回來，再整，那一本書應該有掛名。

後來因為持續做白色恐怖資料整理的關係，連帶地也做了一些受難者和家屬的口述歷史。另一方面，為了釐清台灣民主運動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台灣主體論述的發展，以及受託進行殷海光教授相關人士的口述歷史，我也做了一些訪談，不過幾乎都沒有發表。

接著，許雪姬教授就找我去參加國會耆宿的口述計畫<sup>25</sup>，你問我為什麼會負責那幾個人？因為許老師說凡是財經的都歸我，你看我寫《、的條目，戰後大部分的法規也是我寫的。我參加國會耆宿的口述工作，要感謝我的助理郭凱迪，他很認真，劈哩啪

---

22 鄭欽仁(1934-)，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東海大學歷史學系畢，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23 劉季倫，現任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專長為明史、中國思想史、明清思想史、中國現代思想史。

24 潘光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胡適紀念館館長。

25 立法院議政博物館委託中研院台史所執行之「國會耆宿口述歷史訪談計畫」，由許雪姬、黃富三、吳文星、薛化元、陳翠蓮主訪。

啦找一大堆東西過來，所以有很多課題可以提問。

### (三) 口述歷史操作的流程

現在我做口述歷史，一定先做好書面的準備工作，去訪問之前，只要有資料的，大約準備一萬多字的資料。我根據這些資料準備問題，也作為口訪後的對話基礎。雖然如此，有時候學生做的記錄都有一些早已經知道，不應該有的錯字，我有時會責備學生：口述不當場記筆記，只靠耳朵跟錄音帶，回家只有聲音失去臨場感，不容易做好。所以口訪一定當場要記筆記，重要的 key point 都要記下來，回來先依序做第一次口述稿整理。我去之前已經有了架構，我逼助理再把稿子整到一個架構，這是第一步的整稿。完成之後，就會先交給一個執行的助理，加補註釋。然後我看哪些不對，畫起來，再丟給負責的助理查證。我畫到的地方通通把它校對改出來，差不多到這個地步。比較痛苦的是，有時候報告催得很急，我只來得及改我的，別人的我來不及改，常常被審查人批評。有的前輩審查人甚至問說：「你看了沒有？」我總不好老實跟他說：「我印製前一天才拿到稿子呀」。基本上，我的標準程序是這樣：逐字稿完，整進我的架構裡，然後這個架構是事先已經弄好的，補註解，我改完再確認，再補註，再修改，差不多這樣。特別是，有檔案或是相關書面資料的，一定要事前、事後作對照，讓口述內容和書面資料對照，才更容易呈現歷史的面貌。

### (四) 口述訪談中遇到的困難

收回受訪人稿子改得面目全非是常見的，我會按照他的意見

留下來，但是我繼續加註。如果我的資料不對，更要修正，這應該是整稿要做的，我覺得這很重要。

進行口述訪談比較遺憾的經驗，是受訪者在訪談告一段落之後，不能接受訪談紀錄的期中報告必須在定稿前先送審，最後拒絕簽署訪談稿的授權書。口述歷史工作有時會發生訴訟爭議，我看到一些前輩被告。至於我怎麼處理有爭議的問題呢？我會跟當事者討論引用新聞報導或是史料的方式呈現，譬如說：受訪人在訪談中指控某人是抓耙子，為避免法律問題，我會避免直接陳述受訪人的指控，而是間接引用相關新聞報導，例如幾月幾號某報新聞提到某某人是「抓耙子」。或者在文句中用「同案的某某人」，然後再加註用判決書把人名留下來。出版這些東西真的很頭痛。但是這個很重要，除了儘量避免爭議外，還是應該留下一些歷史是非嘛。

### (五) 口述歷史的意義

口述歷史工作對我來講，主要是對社會的回饋，而不是發自研究的迫切需要；對我而言，這絕對不是重點。因為每一個人研究有不一樣的取徑，研究的主題也不一樣，我的著作沒有用太多口述歷史這是事實。但我認為口述歷史很重要，我覺得有些關鍵地方的對照很重要。我有時是感到很痛恨，因為我沒有發現時間過那麼快，假如讓我回到我剛在交大任教的時候，假如讓我再回到那個時候，打死我都會去把那個尹仲容<sup>26</sup> 相關的口述歷史做出

---

26 尹仲容(1903－1963)，本名尹國墉，本籍湖南邵東人，是1950年代影響台灣經濟的關鍵人物，也是1950年代中，擁有自由貿易思想的官員。



2005年9月攝於京都鴨川

來，我現在就不用跟課綱微調主張財經官僚有關鍵性貢獻的觀點打得那麼辛苦。

我自己遺憾的是，如果我八叔公薛仰瑞還在的話，這些部份他會講得更仔細，因為他在物資局服務，是台籍官員位階最高的，他們直接互動。而且擁有政治權力的人，特別是在過去，怎麼可能放棄經濟的主導權？加上我從台灣早期的企業發展來看，看不到有「政治是外省人主導、台灣人主導經濟」這種可能性。因為他們在主導經濟，什麼透過耕者有其田，台灣人地主就變成企業家，你在「酣眠」咧！「咁有影」？如果只講四大公司股票

釋股給地主，只有四大公司，能有幾個企業家？而且不可忽略他把四大公司股本膨脹七倍到十一倍，然後再跟台灣人換土地。加上當時根本沒有證券市場，四家公司除台泥外，狀況都不太好，工礦、農林更幾乎沒有配息。因此，有關台灣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必要做更深入的討論。

基本上，參與這些口述工作，主要是加深我對歷史的認識，是要去跟受訪者對話。我把跟長輩們的對話當作是很重要的事情，努力在口述中為受訪者作資訊的對答，把我蒐集到的資料送給他們，包括被管訓的紀錄等等，他們都很感動。所以在去訪問之前，一定要把所有的疑問都先記下來，這樣對我自己才會有幫助。我希望口述工作不是只為了作一個計畫領一些錢，是真的對理解我的長輩的人生有很大幫助。